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兰州大学“敦煌丝路文明与西北民族社会”双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郑炳林 主编

类书研究通论

刘全波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兰州大学“敦煌丝路文明与西北民族社会”双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郑炳林 主编

类书研究通论

刘全波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类书研究通论 / 刘全波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 2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 郑炳林主编)

ISBN 978-7-5490-1556-6

I. ①类… II. ①刘… III. ①百科全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Z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1946号

类书研究通论

刘全波 | 著

策 划 | 马永强 王 智 郟军涛

项目负责 | 郟军涛

责任编辑 | 郟军涛 凯 旋

装帧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312 千

印 张 | 20.75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556-6

定 价 | 7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总 序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碰撞、交融、接纳的通道，丝绸之路沿线产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文明，丝绸之路文明是这些文明的总汇。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它是丝绸之路文明最高水平的体现，敦煌的出现是丝绸之路开通的结果，而丝绸之路的发展结晶又在敦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敦煌学，是一门以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敦煌学的外缘和内涵并不清楚，学术界至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认它的存在。有的学者根据敦煌学研究的进度和现状，将敦煌学分为狭义的敦煌学和广义的敦煌学。所谓狭义的敦煌学也称之为纯粹的敦煌学，即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而广义的敦煌学是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主，包括敦煌汉简，及其相邻地区出土文献，如吐鲁番文书、黑水城出土文书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研究；以敦煌石窟为主，包括河西石窟群、炳灵寺麦积山陇中石窟群、南北石窟为主的陇东石窟群等丝绸之路石窟群，以及关中石窟、龙门、云冈、大足等中原石窟，高昌石窟、龟兹石窟以及中亚印度石窟的石窟艺术与石窟考古研究；敦煌历史地理为主，包括河西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以及中古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严格意义上说，凡利用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可以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范畴。

敦煌学研究是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兴起的一门学科，敦煌文献经斯坦

因、伯希和、奥登堡、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劫掠，王道士及敦煌乡绅等人为流散，现分别收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瑞典、丹麦、印度、韩国、美国等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因此作为研究敦煌文献的敦煌学一开始兴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留存中国的敦煌文献除了国家图书馆之外，还有十余省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收藏有敦煌文献，其次台北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香港也收藏有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具体数量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在五万卷号左右。敦煌学的研究随着敦煌文献的流散开始兴起，敦煌学一词随着敦煌学研究开始在学术界使用。

敦煌学的研究一般认为是从甘肃学政叶昌炽开始，这是中国学者的一般看法。而 20 世纪的敦煌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49 年前为敦煌学发展初期，主要是刊布敦煌文献资料；1979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前，敦煌学研究停滞不前；1979 年之后，由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中国学术界有计划地进行敦煌学研究，也是敦煌学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阶段。目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丝路明珠的敦煌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新时期的敦煌学在学术视野、研究内容拓展、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我们将之归纳如下：

第一，敦煌文献资料的刊布和研究稳步进行。目前完成了俄藏、英藏、法藏以及甘肃藏、上博藏、天津艺博藏敦煌文献的刊布，展开了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再一次掀起了敦煌文献研究的热潮，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上，郝春文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辑录校勘工作已经出版了十五册，尽管敦煌学界对其录文格式提出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这是敦煌学界水平最高的校勘，对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有敦煌经部、史部、子部文献整理和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正在有序进行。专题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也出现成果，如关于敦煌写本解梦书、相书的整理研究，郑炳林、王晶波在黄正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即将整理完成的还有敦煌占卜文献合集、敦煌类书合集等。文献编目工作有了很大

进展，编撰《海内外所藏敦煌文献联合总目》也有了初步的可能。施萍婷先生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王重民先生目录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内容。荣新江先生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经文献残卷目录（6981—13624）》为进一步编撰联合总目做了基础性工作。在已有可能全面认识藏经洞所藏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学术界对藏经洞性质的讨论也趋于理性和全面，基本上认为它是三界寺的藏书库。特别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一万余卷，分别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市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对这些单位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定名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刊布了敦煌市档案局、甘肃省博物馆藏品，即将刊布的有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藏品目录，这些成果会对敦煌学研究产生很大推动作用。在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上还有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敦煌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中有很多新成果和新发现，如唐代著名佛经翻译家义净和尚的《西方记》残卷，就收藏在俄藏敦煌文献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义净和尚在印度巡礼的情况和遗迹；其次对《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复原的研究，证实敦煌文献的残缺不但是在流散中形成的，而且在唐五代的收藏中为修补佛经就已经对其进行分割，这个研究引起了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的高度重视。应当说敦煌各类文献的整理研究都有类似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敦煌学论著的出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试图对敦煌学进行总结性的出版计划正在实施，如2000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百年文库》、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丛书，但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所以目前还没有一部研究丛书能够反映敦煌学研究的整个进展情况。随着敦煌文献的全部影印刊布和陆续进行的释录工作，将敦煌文献研究与西域出土文献、敦煌汉简、黑水城文献及丝绸之路石窟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敦煌学研究的领域，才能催生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第二，敦煌史地研究成果突出。敦煌文献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文献档案，反映当时敦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状况，因此研究敦煌学首先是对敦煌历史特别是归义军历史的研究。前辈学者围绕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成果很多，如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等。近年来敦煌历史研究围绕着归义军史研究推出了一批显著的研究成果。在政治关系方面有冯培红、荣新江同志关于曹氏归义军族属研究，以往认为曹氏归义军政权是汉族所建，经过他们的详细考证认为曹议金属于敦煌粟特人的后裔，这是目前归义军史研究的最大进展。在敦煌粟特人研究方面，池田温先生认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从吐蕃占领之后大部分闯到粟特和回鹘地区，少部分成为寺院的寺户，经过兰州大学各位学者的研究，认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并没有外迁，还生活在敦煌地区，吐蕃时期属于丝棉部落和行人部落，归义军时期保留有粟特人建立的村庄聚落，祆教赛神非常流行并逐渐成为官府行为，由蕃部落使来集中管理，粟特人与敦煌地区汉族大姓结成婚姻联盟，联合推翻吐蕃统治并建立归义军政权，担任了归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归义军职官制度是唐代藩镇缩影，归义军职官制度的研究实际上是唐代藩镇个案研究范例，我们对归义军职官制度的探讨，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归义军的妇女和婚姻问题研究交织在一起，归义军政权是在四面六蕃围的情况下建立的一个区域性政权，因此从一开始建立就注意将敦煌各个民族及大姓团结起来，借助的方式就是婚姻关系，婚姻与归义军政治关系密切，处理好婚姻关系归义军政权发展就顺利，反之就衰落。所以，归义军政权不但通过联姻加强了与粟特人的关系，得到了敦煌粟特人的全力支持，而且用多妻制的方式建立了与各个大姓之间的血缘关系，得到他们的扶持。在敦煌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研究上，搞清楚了归义军疆域政区演变以及市场外来商品和交换中的等价物，探讨出晚唐五代敦煌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会城市，商品来自于内地及其中亚南亚和东罗马等地，商人以粟特人为主并有印度、波斯等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敦煌，货币以金银和丝绸为主，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棉花种植问题，敦煌与高昌气候条件基本相

同，民族成分相近，交往密切，高昌地区从汉代开始种植棉花，但是敦煌到五代时仍没有种植。经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棉花，并将棉花作为政府税收的对象加以征收，证实棉花北传路线进展虽然缓慢但并没有停止。归义军佛教史的研究逐渐展开，目前在归义军政权的佛教关系、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科罚制度、藏经状况、发展特点、民间信仰等方面进行多方研究，出产了一批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和《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中。如果今后归义军史的研究有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佛教等研究点上。

第三，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之为艺术之路，景教艺术因景教而传入，中世纪西方艺术风格随着中亚艺术风格一起传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汉文化和艺术也流传到西域地区，对西域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如孝道思想和艺术、西王母和伏羲女娲传说和艺术等。通过这条道路，产生于印度的天竺乐和中亚的康国乐、安国乐和新疆地区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音乐舞蹈也传入中国，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由外来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清乐融合而产生的西凉乐，成为中古中国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音乐舞蹈的发展。佛教艺术进入中原之后，形成自己的特色又回传到河西、敦煌及西域地区。丝绸之路上石窟众多，佛教艺术各有特色，著名的有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南石窟、大象山石窟、水帘洞石窟、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榆林窟、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祆教艺术通过粟特人的墓葬石刻表现出来并保留下来，沿着丝绸之路和中原商业城市分布。所以将丝绸之路称之为艺术之路，一点也不为过，更能体现其特色。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没有多大改善，即石窟艺术资料刊布不足，除了敦煌石窟之外，其他石窟艺术资料没有完整系统地刊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等只有一册图版，北石窟、南石窟、拉梢寺石窟、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等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介绍，所以刊布一个完整系统的

图册是学术界迫切需要。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石窟在中国石窟和世界石窟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结果。在敦煌佛教艺术中有从西域传入的内容和风格，但更丰富的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佛教内容和风格。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很多新的内容，如报恩经经变和报父母恩重经变，以及十王经变图等，是佛教壁画的新增内容。对敦煌石窟进行深入的研究，必将对整个石窟佛教艺术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专家特别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基本资料的介绍、壁画内容的释读和分类研究等基础研究上，做出很大贡献，成果突出。佛教石窟是由彩塑、壁画和建筑三位一体构成的艺术组合整体，其内容和形式，深受当时、当地的佛教思想、佛教信仰、艺术传统和审美观的影响。过去对壁画内容释读研究较多，但对敦煌石窟整体进行综合研究以及石窟艺术同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还不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套“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比较完整地刊布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完成了第一辑20册。

第四，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学科，研究对象以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为主。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学与相邻研究领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就要求敦煌学将自身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以适应敦煌学发展的需要。从敦煌石窟艺术上看，敦煌学研究对象与中古丝绸之路石窟艺术密切相关，血肉相连。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原地区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乃至中亚石窟等关系密切。因此敦煌学要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就要和其他石窟艺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古石窟艺术关系密切，但是研究显然很不平衡，如甘肃地区除了敦煌石窟外，其他石窟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还不够，因此这些石窟的研究前景非常好，只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就会取得很大的突破和成果。2000年以来敦煌学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集中反映敦煌学界的未来发展趋势，一是石窟艺术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的有力结合，二是敦煌石窟艺术与其他石窟艺术研究的结合。敦煌学研究与西域史、中外关系史、中古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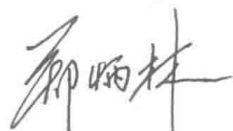
族关系史、唐史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因此敦煌学界在研究敦煌学时，在关注敦煌学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同时，非常关注相邻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如考古学的新发现，近年来考古学界在西安、太原、固原等地发现很多粟特人墓葬，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对研究粟特人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提出了新问题。2004年、2014年两次“粟特人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反映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趋势，敦煌学已经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局面。目前的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将敦煌学研究沿着丝绸之路推动到古代文明研究的各个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视野的拓展，而且是研究领域的拓展。

第五，敦煌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得到新发展。敦煌学的发展关键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早在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初期，老一代敦煌学家季羨林、姜亮夫、唐长孺等就非常注意人才培养问题，在兰州大学和杭州大学举办两期敦煌学讲习班，并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点。近年来，敦煌学学科建设得到了充分发展，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点，1999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共建成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人事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这些都是敦煌学人才建设中的突破性发展，特别是兰州大学将敦煌学重点研究列入国家985计划建设平台——敦煌学创新基地得到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和学校的1000万经费支持，将在资料建设和学术研究上以国际研究中心为目标进行重建，为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走向国际创造物质基础。同时国家也在敦煌研究院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经过学术队伍的整合和科研项目带动，敦煌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态势。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加大，敦煌学发展的步伐也随之加大。甘肃敦煌学发展逐渐与东部地区研究拉平，部分领域超过东部地区，与国外交流合作不断加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领域逐渐得到拓展。研究生的培养由单一模式向复合型模式过渡，研究生从事领域也由以前的历史文献学逐渐向宗教学、文学、文字学、艺术史等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为国外培养的一批青年敦煌学家也崭露头角，成果显著。我们相信在国家和支持下，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一定会成为敦煌学的人才培养、学术

研究、信息资料和国际交流中心。在 2008 年兰州“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上，马世长、徐自强提出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石窟研究基地，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是这个建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很有前瞻性。当然敦煌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也存在问题，如教材建设就远远跟不上需要，综合培养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在国家新的“双一流”建设中，敦煌学和民族学牵头的敦煌丝路文明与西北民族社会学科群成功入选，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发展遇到的又一个契机，相信敦煌学在这个机遇中会得到巨大的发展。

第六，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与吐鲁番、龟兹、于阗、黑水城一样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资料，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丝绸之路文明非常珍贵。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敦煌就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它同河西、罗布泊、昆仑山等因中外交通而名留史籍。汉唐以来敦煌出土简牍、文书，保留下来的石窟和遗迹，是我们研究和揭示古代文明交往的珍贵资料，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丝绸之路上文明交往的轨迹和方式。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敦煌学研究就是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而且是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核心。古代敦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也必将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资助出版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囊括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这个群体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个群体经历了很多磨难和洗礼，但仍然是敦煌学研究规模最大的群体，也是敦煌学研究成果最多的群体。目前，敦煌学研究所将研究领域往西域中亚与丝绸之路方面拓展，很多成果也展现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水平。我们将这些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一方面将这个研究群体介绍给学术界，引起学者关注；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督促他们不断进行研究，力争研究出新的成果，使他们成长为敦煌学界的优秀专家。



目 录

第一章 类书的定义	001
一、类书是什么?	001
二、类书是知识性的资料汇编	013
三、小结	017
第二章 类书的渊源	019
一、类书源出“杂家”说	020
二、类书源出《尔雅》说	024
三、类书源出“赋”说	027
四、其他类书源出说	031
五、小结	035
第三章 类书源出“史部”说	037
一、《皇览》与“史部”的关系	037
二、《史林》《科录》与“史部”的关系	044
三、《四部要略》的编纂与类书发展空间的扩大	048
四、类书与史钞之关系	052
五、小结	054
第四章 类书的编纂	057
一、抄撮、抄撰之风与类书编纂	058

二、记诵之学与类书编纂	068
三、博学风尚与类书编纂	071
四、知识主义与类书编纂	074
五、小结	077
第五章 类书的分类	079
一、类书发展之趋势	079
二、类书分类之层次	089
三、敦煌类书的分类	095
四、小结	108
第六章 类书的流变	111
一、“事类”与“类事”	112
二、从“事类”到“类书”	114
三、关于类书目录学位置的争论	119
四、小结	132
第七章 类书的流传	135
一、类书在日本的流传	135
二、类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	139
三、类书在越南的流传	147
四、小结	151
第八章 类书的流弊	155
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156
二、“獭祭”“短钉”之学	158
三、科举严禁之书	162
四、类书的僵化与生命力	166
五、小结	171
第九章 类书的功用	173
一、类书与政治	173

二、类书与文学	180
三、类书与科举	184
四、类书与教育	187
五、类书与日常生活	189
六、小结	195
第十章 类书文献学	197
一、类书辑佚学	198
二、类书版本学	200
三、类书出版史	205
四、关于类书研究的思考	211
附录一：百年敦煌类书研究回顾	215
一、《修文殿御览》	216
二、《类林》	218
三、《事林》《事森》	221
四、《珞玉集》	222
五、《勤读书抄》	223
六、《应机抄》	224
七、《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	224
八、《励忠节钞》	227
九、《语对》	230
十、《簠金》	232
十一、《蒙求》	235
十二、《李峤杂咏注》	237
十三、《古贤集》	238
十四、《兔园策府》	240
十五、《杂抄》	243
十六、小结	245

附录二：百年类书研究论著目录	247
一、著作	247
二、论文	251
三、外文著作	322
四、外文论文	324
后 记	331

第一章 类书的定义

一、类书是什么？

类书是一种知识性的资料汇编,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分类意识、分类能力达到一定高度,知识沉淀达到一定厚度的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知识浓缩而成的典籍越来越多,且古今论著一旦浩瀚起来,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博闻强识的学者也开始渐渐变得无法遍览。《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载:“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①面对六艺经传,博学多闻的太史公司马迁早在西汉时代就发出了这般无可奈何的感慨。诚然,古人在没有现代化检索、阅读工具帮助的情况下,记忆力、阅读力是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有大幅度或较快提升的,面对日益增多的各类知识,记忆力、阅读力的严重滞后就成为人与知识之间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类能力来自于人的分类意识,是人类天生的把握世界的基本生存能力之一。^②《周易正义》卷一就载有:“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0页。

^② 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之《分类之原理》认为分类能力不是人类之本能,而是丰富经验之结果,笔者认为分类能力应是人类天生的认知世界的本能,只是这种天生的能力有待丰富经验之不断加强。《中国目录学史》载:“西洋目录学家每谓分类为人类之本能;实则积得丰富之经验后,自然有鉴别之知识耳;谓为本能,则未必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其类也。”^①而且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这种分类意识、分类思想、分类能力、分类经验不断得到强化,类书的出现就是这种分类能力在图书知识领域得到快速提升的集中体现。当古代读书人依靠分类意识、分类能力、分类思想、分类经验对浩瀚的典籍、知识进行分类时,将具有共同特点的一类知识或者几类知识汇聚在一起并按照某种方法进行排列组合时,一种便于阅读、记忆、查阅的资料汇编(类书)也就产生了。^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事物之分类》言:“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③当然,类书的产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绝不会是历史偶然性发展的产物,而是经过人类社会文化的长期积淀,并在一个文化知识大发展、大进步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来的。

邓嗣禹《中国类书目录初稿·叙录》言:

类书之作,肇于《皇览》,由来久矣。自书契以来,典籍日繁,人生有涯,事难尽稽;虽毕岁月于披寻,穷心目于究探,而周知不易,记诵尤难。于是类事类文之书,应运而起,或以供人君乙览,或以备一时之偶忘;而其体例,则大抵以类相从,如钱就贯;或依韵编次,左右逢源。使俭腹者资以馈贫,秃笔者赖以利润,为学者持以寻检,从政者得以流览;省时节力,用至广也。^④

伍杰《中国类书·序》又言:

类书是个古老而新鲜的题目。说它古老是因为远在一千多年前就有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②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并不是只要以类相从的将知识排列在一起就是类书了,以类相从是类书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以类相从都是类书,如果所有的以类相从都是类书,那么类书的产生就要提前到先秦甚至有文字记载的更早的时代了,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第二章详细解说。

③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④ 邓嗣禹编:《中国类书目录初稿》,台北:古亭书屋,1970年,第IV页;又见邓嗣禹编:《中国类书目录初稿》,台北:大立出版社,1982年,第IV页。《中国类书目录初稿》原题《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1935年4月出版,以上两版本均是对1935年初版的影印。